

海上杂文家

自选丛书

haishang

z i x u a n c o n g s h u

立此存照

刘 金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章祥

封面设计：袁银昌

海上杂文家自选丛书

立此存照

刘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邮件：cslcm@public1.sta.net.cn

网 址：www.slc.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翔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875 插页 2 字数 187,000

1999年5月第1版 1999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500册

ISBN 7-5321-1861-4/I·1512 定价：13.00元

自序

就写杂文而言，我可以说是鲁迅先生的私淑弟子。一九四三年，福建省战时省会的永安，我在一个机关做着抄写公文的书记。说来令人难以置信，这机关颇具规模的图书馆里，二十卷本的《鲁迅全集》居然有两套：一套红色布脊纸面精装，一套蓝色全布面精装。后者是鲁迅纪念委员会赠给先生的同乡陈仪的。

我如饥似渴地读了《鲁迅全集》的大部分，喜爱上了先生嬉笑怒骂、锋利泼辣的杂文。加之对当时世相世情感慨甚多，便也效颦写起杂文来。又有幸碰上《民主报》副刊《新语》主编董秋芳先生。董先生是鲁迅的同乡、学生和朋友，也擅写杂文。一九二六年“三·一八惨案”以后，他一口气写了《可怕与可杀》等五篇刺向反动当局的匕首和投枪式的杂文，发表在《语丝》和《晨报副刊》上。——时，董先生长省府图书馆，并兼任着《新语》的主编。董先生编副刊，特注重对青年的发现和提携。以此，我的幼稚的文章，一开始就得他青睐，至于每稿必登的地步。我习作杂文，于是一发而不可收。

两年后，我回乡参加了新四军游击队。后来做了部队报纸的记者。杂文也就没有机会、也没有必要再写。直到七年以后，

在新文艺出版社工作时，虽然明知毛主席早在一九四二年就说过，杂文的形式和笔法，“不应该简单地和鲁迅一样”，不知深浅的我，还是技痒难禁，写了《紧箍咒之类》等几篇杂文，发表在《萌芽》和尚丁主编的一个刊物上。不料“反右”一来，这两篇文章就被支部书记指为“右派言论”，并且“比右派进攻得还早”。后来，幸而仁厚长者李俊民社长仗义执言，我才免于堕入“右派”的深渊。时隔两年，又莫名其妙地刮起了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旋风，我因《从看花想到看戏看书》（要害是主张“要宽大为怀”）等文章，被内定为出版系统十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之一。这一次，又幸运地得到陈其五同志一言相救而免祸。

俗话说：躲得过初一，躲不过月半。我侥幸“躲”过了“反右”和“反右倾”，然而“躲”不过“文革”浩劫。“文革”一来，我的杂文，统统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毒草”，有的则是“隐射攻击毛主席”和“姚文元同志”的“毒文”。1968年2月21日，又有劳“四人帮”江、姚二帮主亲自出马，点了我的名……这种种，现在都无法细说，也无须细说了。

“四人帮”覆灭，大地重光，我又故态复萌，渐渐写起杂文来。迄今二十年中，论数量写得不算太少。但自愧没有多少长进。我写杂文，是从模仿鲁迅起步的。但五十五年后回头看去，鲁迅杂文仍令我望尘莫及。我之所作，无非效颦而已。

感谢上海文艺出版社，构想出版这样一套杂文自选集，并给了我一席之地。于溽暑中，将二十年来所作文字，爬罗剔抉，选编成，名之曰《立此存照》。岂此中文字，及其所针砭、所讥评、所挞伐的世象世风，是耶非耶？可乎不可乎？难免见仁见

智，人言言殊，姑立此存照已耳。

刘金 1998 年 7 月杪于沪上

目 次

自序·····	1
剥掉他那张皮·····	1
论“鬼打墙”·····	4
坏,相,诸如此类·····	7
以“人和”为宝·····	11
人心齐,泰山移·····	14
愿这出老戏终于唱完·····	17
读书偶记·····	20
人们,要警惕啊!·····	23
放齐、骧宛及其他·····	25
地藏菩萨式的官僚主义·····	28
“李老君”该当何罪!·····	31
有感于“论定”之难·····	33
以赵鼎为鉴·····	37
“吃喝玩乐”新诠·····	39
文学的自由与功利·····	42
“克勤于邦,克俭于家”·····	46
不懂的文章·····	48
“我的骆驼照样前进”	

——纪念雪克同志	51
劳而无功的考证	55
杨朱,幸乎?不幸乎?	59
李时珍辞职	62
“为×者讳”	65
“世界无烟日”感言	67
高山仰止话晏婴	69
“俭,德之共也”	72
“发型大奖赛”观后	74
从“不修边幅”到“时装热”	77
从庄子休到查第格	80
无字的文和无音的乐	83
我期期以为不值	86
“玉皇大帝女儿”给我们上课了	89
再说杨朱和他的主义	91
“耻恶衣恶食”论	94
话说屈原、太卜和渔父	97
闻说关公貂蝉将“创新”	100
“非相”新篇	103
从《周易》说到《烧饼歌》	106
成子高的生死观	109
“黄帝就是混沌”说质疑	112
《剪拂集》之林语堂	118
请死鬼丛松坡上课	122
摆阔·崇阔·效阔	124
必也“责实”乎!	127

是是非非说老鼠·····	130
拜金主义的畸形表演·····	133
鬼话连篇意如何? ·····	136
这位“不说话的老师”太那个·····	139
李时珍再辞名誉职·····	142
狮子身上的虱虱·····	145
更新乎? 更旧乎? ·····	148
“两面人”种种·····	151
苦丁茶、书卷气及其他 ·····	154
袁宾基和他的《金文新考》·····	157
人狗之间·····	163
包公学得学不得? ·····	167
命运和“名运”·····	170
车品与人品的反差·····	172
“离体意识”的“鬼话”·····	175
中国人无须自卑·····	180
破一种“人物链”·····	183
画人与画鬼·····	186
一个死结吗? ·····	189
传记和谎言·····	192
说酒·····	195
武大郎在矛盾中·····	198
“唯恐不好名”析·····	201
二诸葛状告赵树理·····	204
辫子的沧桑·····	207
从“消解意义”想到庄子·····	210

名·名人·名人录·····	213
闻“耗子吓昏猫”有感·····	216
有感于“富村穷书记”·····	218
何必选“吃喝大王”·····	220
荒唐的“对号入座”·····	222
文徵明论岳飞之死·····	225
我的杞忧·····	228
朱买臣妻之冤·····	231
冤哉俄狄浦斯·····	234
“小说家言”的是非·····	237
痛苦而沉重的思索·····	240
难忘一课《千人糕》·····	243
二诸葛的不平·····	246
板桥应悔“糊涂”辞·····	248
从“安仙姑”说开去·····	251
一种吮本钱买卖·····	254
“史弊”之鉴·····	257
孔子的“理想国”·····	260
“据说”论与“牛二逻辑”·····	263
惊闻大学开设“风水课”·····	268
别再折腾了!·····	270
青乌先生的忧喜·····	272

剥掉他那张皮

一九三七年一月七日《大晚报》副刊上，有一篇张春桥的文章，题为《速写红萝卜》。据张春桥说：有这样一种人，“用一位先行者底说法，叫做红萝卜：有时，当新兴势力起来了，他红头红脑地跑出来，大声叫道：‘我是卡——伊主义者！’……并且表示自己是真的卡——伊主义者，就尽量的抄先哲底文句。”

虽然我个人不很熟悉当时文坛的情况，但可以肯定，这种应运而生的“红头红脑”的所谓红萝卜，的确是有的。活生生的例子，“红头红脑地跑出来”炮制这篇《速写红萝卜》的张春桥其人，就是货真价实的一个。他在《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这篇文章的篇首，不是就抄着斯大林的文句：“自我批判之于我们，犹如空气、水一样的需要。”以“表示自己是真的卡——伊主义者”吗？

其实，拿红萝卜来比喻伪装革命的反革命，是不很确切的。红萝卜，虽然表里的颜色不一致，却是生来如此的。这是它的本相，而不是为骗人而披上的伪装。人们一看它那鲜红的皮，就知道它的肉是白的，就知道它是一个红萝卜，而不是别的什么。如果有谁看了它的皮，就以为它的肉也一定像西瓜瓤

似的鲜红，那恐怕是个呆子。他的错误，是不能叫红萝卜负责的。

所以，实在说，红萝卜不是坏东西，也没有什么危险。它不像有些人那样，会冒充“卡——伊主义者”，冒充左翼作家，自我广告说：“我是真正彻里彻外通红的呀！”真正危险的是那些披着各式伪装的人面东西。例如：披着羊皮的狼，披着人皮的“老虎外婆”，披着美女画皮的恶鬼，以及张春桥所发明的“披着战士的衣裳的苍蝇”，等等。而张春桥，就是这么一个极端危险的人面东西。

在三十年代，张春桥一面向国民党反动派眉来眼去，一面把矛头戳向反映抗日斗争的进步小说，叫嚷着：“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呀！但是，并没有能逃过鲁迅锐利的目光。鲁迅一眼就看穿了：这个“红头红脑地跑出来”充作“我们”的狄克，骨子里是属于“他们”——国民党反动派的呀！于是鲁迅写了《三月的租界》，投一光辉，就使隐藏在红外衣下面的这个恶鬼原形毕露了。

尽管麒麟皮下的马脚已经毕露，张春桥骗人的红外套还是不肯脱掉，反而裹得更紧。他马上写信给鲁迅，辩解说：“关于我那篇文章，所以要写它，……是一片‘好心’”，“对于田军，像对于每一个进步的作家一样，我是具着爱护心的。写那篇文章，也似乎是由于太热爱了些”。哈哈，以扼杀为“热爱”，真要叫人笑掉了大牙。不仅如此，鲁迅一逝世，他接连写了两篇所谓悼念的文章，把自己打扮成是鲁迅用“奶和血”喂过的“伙伴和儿女”。

然而，这种种花言巧语，统统不过是张春桥的画皮。鲁迅安葬以后不久，张春桥就唆使他的一个小兄弟，约田军到虹桥

路鲁迅墓前决斗，以表示他对田军的“太热爱”，并借此发泄他对鲁迅的仇恨。

待到一九三八年，张春桥终于“红头红脑”地钻进解放区，钻进革命队伍里来了。从此以后，这个张春桥怎样“红头红脑”地为非作恶，已经众所周知，不必说了。

在《速写红萝卜》里，张春桥提醒人们说：“记着那张皮吧。”对于张春桥的层层画皮，我们现在是，不光“记着”而已，干脆把它一张张剥落，把他的“老虎外婆”、恶狼、狞鬼、苍蝇四者兼而有之的本相，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原载 1977 年 5 月 21 日《文汇报》）

论“鬼打墙”

世界上是没有鬼的。但类似鬼那样，会吓人、迷人、害人的东西，却是有的。林彪、“四人帮”就是。所以在我们的口语里，就有不少跟鬼沾了边的词汇，例如：鬼鬼祟祟，鬼头鬼脑，鬼蜮伎俩，鬼点子，鬼推磨，鬼打墙……等等。

关于“鬼打墙”，需要作点说明。因为它可能是我家乡的特产，一般人也许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何谓“鬼打墙”？单身夜行，匆匆赶路，不知不觉偏离了道路或迷失了方向。有人辛辛苦苦走了一夜，天明一看，还在原地打转；有的人，竟然走到了本不应该去的悬崖边缘或深渊之滨，天明一看，不禁吓出一身冷汗——险哉！其实，是在黑暗中自己走迷了路，然而在缺乏科学知识，迷信鬼神的旧时代，众口一辞，这就成了所谓“鬼打墙”。

当然，“鬼打墙”是没有的。但是，类似“鬼打墙”这样的事，又是有的。眼前就有一些这样的例子在。

“四人帮”作为一个帮，已经寿终正寝，呜呼哀哉了。——读到这里，可能有的同志要皱眉头：粉碎“四人帮”是大快人心事，怎么跑出“哀哉”来了？你做文章的人，立场——说得轻点——感情有点不对头吧？

对不起，如果有的同志这样责备我，恰恰让我抓住了一个“鬼打墙”的活的例子。这不就是“四人帮”抓住片言只语，断章取义、捕风捉影、无限上纲、扣帽打棍的“帮记批判术”的阴魂，大天白日，跑出来对我我搞“鬼打墙”吗？其实，我说的“呜呼哀哉”，原是一句成语，无非是说，覆灭了，完蛋了。哀不哀的，原不必咬嚼这个字。

“四人帮”作为一个帮，虽然已经完蛋了。但它的阴魂（它思想上理论上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和“左”的流毒）却是至今没有散尽的。它到处游荡着，时时作祟，干些“鬼打墙”的勾当，来伤害我们的事业。你要拨乱反正，健全规章制度吗？它就在无形中用“反对管卡压”的砖头，给你筑起两堵墙，使你置身于夹墙弄中，两面碰壁，进退维谷。或者顺着它那夹墙弄走去，落入它预设的陷阱之中。你要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不劳动者不得食吗？“四人帮”的阴魂又来“鬼打墙”了，它用“物质刺激”、“资本主义复辟”之类的“红”砖给你筑起两堵夹墙，叫你左右为难，裹足不前。你要恢复某些被“四人帮”破坏殆尽了的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吗？“四人帮”的阴魂又用“复旧”“复辟”“倒退”之类的“红”砖，到处玩起“鬼打墙”来，把你搞得晕头转向。——诸如此类，透过人们通常所说的“余悸”和“余毒”，我们仿佛看到了“四人帮”憧憧的鬼影，如今还在那里大耍其“鬼打墙”的把戏。凡鬼魅都害怕光明。旧时老乡们说，要是遇到“鬼打墙”，马上点起一把火来。火光一亮，鬼墙消散，道路在前，再不会晕头转向了。我们现在也要点起一把火，这把火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把真理之火一亮，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革命精神大放光芒，“四人帮”

不散的阴魂——它那以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为形气的“鬼打墙”也就不攻自灭了。

(原载 1979 年 1 月 21 日《光明日报》)

坯,相,诸如此类……

旧时代,我们嵊县乡间,骂人话里有个“坯”字。什么“贼坯”,“贱坯”,“下作坯”,“杀头坯”……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个“坯”字的含义,不容易解释得十分清楚。大致说来,它包含质地和外貌这两方面的内容。意思是,生成就是这么一块料,这么一种相。

按照封建迷信的唯心主义先验论的观点,一个人的穷通寿夭、贵贱贤愚,是生成如此的,并且烙印在他的长相上。若到古书中去查一下,那么,帝王之相,多是“天庭饱满,地角方圆”,或者“隆准巨口,耳大垂肩”。宵小之人呢,一定“獐头鼠目”。这种唯心主义先验论,发展起来,就成为“相术”。一个人,要知前程运命如何,可以去请教相士,或相面,或相骨(吉卜赛女人则是相手),一相便知。在旧社会,人民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又缺少科学文化知识,所以这种骗人的相术,曾经很有市场。

解放以后,千千万万受苦受穷的劳动人民翻身做了主人,过上了好日子。过去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地主老财呢,被打翻在地,尝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滋味,福是再也享不成了。这两大对立阶级中的每一个人,他们的骨骼相貌,乃至手纹,

过去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各人的贫富苦乐，却来一个今昔大颠倒。于是乎，骗人的相术破了产，再也没人相信了。

但是，麻衣道者（传说是《麻衣神相》的发明人）和柳庄相士（传说是《柳庄相法》的作者）之流，想不到，在破产多年之后，还可以得到一点不小的安慰。他们的相术，在二十世纪的七十年代，竟被“四人帮”所师承，并且扩展到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的领域去了。“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曾经把这种江湖相术创造性地用于文艺创作。塑造人物，正面人物有正面人物的“坏”和相，反面人物有反面人物的“坏”和相。泾渭分明，一看便知。比如拍电影，正面人物总要“近大亮”，反面人物一律“远小黑”。这样倒好：人物一出场，三岁小孩也知道：“这个是好！”“这个是坏人！”

省事是很省事，效果也强烈。但是，可惜糟踏了现实主义。——说起现实主义，现在是不要紧了。若在几年以前，姚文元的棍子就要打来，责问你：有各种现实主义，有批判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你鼓吹的究竟是哪种现实主义？！——这并非我的过虑，有一九五九年姚文元的大作可证。现在是不怕了。我要斗胆说一句：文艺既是现实的反映，总要讲现实主义。至于究竟是什么现实主义，那是和作家的世界观紧密联系着的。无论“批判”也好，“新”也好，“超”也好，都从作家的世界观派生出来，而不是现实主义本身的罪过。摒弃现实主义搞创作，只有“四人帮”“从路线出发”“主题先行”的阴谋文艺才办得到。

文艺是现实生活的反映。生活可不像“四人帮”所“设计”的那么简单。生活里面，坏人既不在胸前挂着牌子，也不在额上大书特书，曰：“我是坏人！”有人说，“四人帮”炮制的影片里